

我叫清水真澄，现在住在前桥市广濑町。

1941年9月29日我出生在旧满洲的北安省，也就是现在的黑龙江省。我父亲叫清水清作，母亲叫清水律子。

听说在去满洲之前，我父亲住在下仁田町，是木匠。因为不景气没了工作。后来，我父亲就响应国家号召，1937年作为第6期群马海伦开拓团的先遣队，只身一人去了满洲，从事开拓团的住宅建筑工作。

听说，他们请当地人教他们中国式的房屋的建法；还听说，海伦车站就是我父亲他们建的呢。另外，因为我父亲他们迁入的垦荒地区是荒地，所以开拓团的人们和当地的住民一起从头开始开垦那片荒地。这之后，当在满洲的生活安定下来的1939年，我父亲临时返回日本，把我爷爷、奶奶、妈妈和当时两岁的哥哥一起接到了满洲，一家人迁入到了北安省海伦县五井子村。开拓团的本部设在三井子村，村里有学校、寺院、医院、商店什么的。每个村里也都住着中国人，听说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相处得很友好和睦。

爷爷、奶奶和叔叔一家就住在附近。另外，我父亲的中国人的木匠工友也住在附近。

（停顿）

我三周岁的1944年那年，我弟弟出生了，家里成了5口人。

我父亲经常带我们玩儿。在村里的庙会上，他带着桃太郎的面具和我们一起跳舞，还常常背着我去喝酒呢。

（停顿）

1945年5月，父亲以及开拓团里的所有健康男性都被应征到了军队里。

我记不起当时的事情了，听说那时我用手拽着父亲的衣服，大声哭着说：“我也要去。”就这样，村子里只剩下了下体弱者、老人、妇女和孩子。

当年的 8 月，我们收到了父亲寄来的他自己的头发和指甲。8 月 12 日那天，留下来的开拓团员大约 500 人都到了设有本部的三井子村里集合，开始了集体生活。空袭一来，大家就都逃到防空壕里。8 月 15 日听到日本战败的消息，我们还以为就要回日本了呢。大约两周后，来了 3 个苏联兵。因为开拓团的人谁也没有要拿起武器与他们作战，所以我想当时那几个苏联兵只是来监视我们的吧。

（停顿）

9 月 12 日的晚上，大家都开始慌慌张张地藏生活用品和钱。我母亲也把钱缝到了衣服的里子里，把衣物什么的都整理好用包袱皮包起来。到了深夜，突然听到了枪声。中国人的强盗团伙我们把他们叫做土匪，那时，成群的土匪和蜂起的当地居民闯进了村子里。他们抢夺开拓民带着的东西，三十人以上的日本人被杀了。活着的人被集中到了中学校的运动场上，大家都把穿着的衣服脱了给了他们。土匪头子因为是个以前曾经在五井子村里住过的人，大家都求他不要杀我们，这样我们才得了救。后来苏联军用机关枪扫射，好多土匪都被打死了。根据当时的状况记录，记载着那时来袭击的暴徒超过了 1000 人以上。

被土匪杀了的三十多人的遗体，都被搬到了本部的建筑物的里面，连着建筑物一起被火化了。大火接连燃烧了好几个小时，发出了很难闻的味道。那光景和味道，直到今天也难以从脑海中挥去。

（停顿）

第二天，我们要在在苏联兵的护卫下去长春的避难民收容所。可是我母亲觉得身无一文，即使到了长春也没法生活，所以决定不和大家一起去而是留在当地。我想这也许是因为有我父亲的中国人朋友在的缘故吧。这事儿，我们只告诉了一个邻居，和爷爷奶奶也就这样分开了。

（停顿）

大家都走了之后，苏联兵来看有没有留下的人和东西。我们就藏到了学校的厕所里，那里有很多被杀了的土匪的尸体。我们屏住呼吸，等着苏联兵离去。母亲叮嘱我们说：“别出声，被抓住就活不了了。”“这儿有开拓团留下的吃的东西，留在这儿，就能活下去。别老想那些鸡毛蒜皮的事。”那天晚上，当地的人让我们进住进他们的家里，可是苏联兵还在，还是很危险。所以我们又去了原本作为开拓团迁入地的五井子村。我们原来住的家里，已经住上了当地人，所以母亲就让我们呆在什么也没有的仓库里。当地人给我们拿来了被子和食物，所以我们可以有在屋顶的地方躺下来睡觉、吃东西。我记得母亲当时感激地说过：“爸爸的中国朋友给了我们足够买 100 公斤大米的钱呢。”

我们在这里呆了三天，因为这里也不安全，我们又去了八井子村，找我父亲的中国人的木匠朋友。

我母亲擅长编织东西。当地的有钱人家知道了就给我们准备了住房，说让我们住到那里为他们编织穿的衣服。为那家做完活，他们又给介绍了别的有钱的人家，我们就这样过了两年被这家那家叫来唤去的生活。

战争结束时，我母亲和哥哥已经会说一些日常生活的中国话了，可是我还是不会说。不过，和一个比我大两岁的中国女孩儿一起玩儿着玩儿着，也就一点点地学会说了。

（停顿）

1947年，我们和当时给我们借住的雇主一家一起搬到了这一带比较大的丁家楼村。那里有双禄区政府的派出所，是可以得到中国国内信息的地方。我母亲用中国话向村长说了我们家的情况，村里给了我们一间小平房，我们一家人就开始了在那里的生活。我们靠左邻右舍分给的吃的，和母亲、哥哥讨来的食物，总算是勉强糊了口。

（停顿）

1949年，我们又搬到了附近的东吴村。八岁的时候，我上了小学。那时，我和弟弟的中国话都说得很好了，可是同学们还是会说：“说句日语啊。”就这样经常受到嘲弄。要是在外面和母亲说日语的话，就会受人欺负，所以我对母亲说不要和我说日语。在家里，母亲和哥哥说日语，而我和弟弟使用日语的时候越来越少，到了后来，虽然还能听懂，可是说日语却变得很困难了。

（停顿）

到了1950年，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了。我母亲在认识的人的介绍下与中国人再婚，我们又搬到了离东无村6公里远的二井子村。这样，在家里就不再使用日语说话，我和弟弟也就把日语完全忘记了。

我母亲和继父之间有4个孩子，其中的三个孩子因营养不良早亡。继父动不动就为一点儿小事吵架，还喜欢赌博，是个几乎不劳动的人。

我有很多事要做，给牛准备吃的、除草、打水等等。也有晚上就着阴暗的豆油灯剥麻线皮到天亮的时候。这些都是为了卖掉麻线赚点儿现金收入，而且一年之中这样的手工作业要持续3个月以上。即便如此，生活依然还是很艰难，为了赚钱我就到别人家去帮着除草。虽然很辛苦，不过农闲期可以到小学校里学习，还是很高兴。可是，因为交不起学费，在小学毕业前不得已我退了学。真是觉得遗憾的不得了。

（停顿）

我哥哥14岁左右的时候，在一家叫做赵光机械农场的农场里工作了一年。那家农场除了制造拖拉机等的大型农用机械以外还进行实验田耕作。这家农场是日本人在战前建的。之后，中国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接管了这家农场，继续经营。有三十多名日本人的技术员也留在了那里工作。1953年，在那里工作的日本人都回了日本。我哥哥为了做回国准备，回到了远离农场的家中，等待回国的联络。我们也有回国的机会，可是那时我母亲已经再婚，继父不愿意让我母亲把孩子带走，所以我们的归国变得比较困难。不过，我哥哥已经15岁了，而且日语也没问题，所以母亲想让我哥哥先一个人自己回国。但是，联络的信件寄到我哥哥所在的地方的时候，已是归国的船出发以后的事了。

（停顿）

1953年，我母亲寄出去的信，终于寄到了她的老家，也把我们一家4口人平安无事的消息传给了那里的亲戚们。这之后我们也才知道，我父亲从西伯利亚退伍回到了他自己的老家下仁田，并且我父亲也再婚了。

（停顿）

1957年，我16岁的时候，公安局的人来确认国籍。我和母亲一样，选择了日本国籍，拿到了居留证，作为外国人滞留下来。后来听母亲说我才知道，有了这个居留证，日本的护照就比较容易办了。日本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不知道；今后，会不会返回日本也根本不知道，但是意识到了自己是个日本人。

（停顿）

17岁的时候，我当了工人，在大坝工地工作。我们担着水泥用人工人力建造了有名的叫做东方红水库的大坝。18岁的时候，因为小学老师不足，有人问我愿不愿意试试，我就参加了考试。我学的知识是母亲教的。我记忆力非常好，为此母亲看上去很高兴，总是很开心地教我。结果我通过了考试，就去当了小学老师。

19岁的时候，我和在中学当老师的丈夫结了婚。我丈夫知道我是日本人。后来，发生了政治运动，有日本国籍的我就被解雇了。

再后来，我们一家搬迁到了北海镇，和我丈夫的父母一起住，并养育了3个孩子。孩子们小的时候，我在镇里的工厂工作，孩子们长大以后，作为正式员工我到了电气设备公司工作。后来在永住归国之前，我又在海北国营药局卸中心工作了4年。这份工作责任重大，必须要记住1500种中药的药名，对我来说这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

（停顿）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日本人以及和日本人结婚的人都受到了批判。在中

国，因为这是国内运动，有通告说不要把外国人卷进运动中来。而我们呢，也尽量不张扬，不发表意见，小心翼翼地生活。因此，我们没有遇到什么危险的事。

（停顿）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我们终于看到了返回日本的归国之路。1975 年，我母亲带着弟弟利用国费临时回国住了三个月左右。1976 年，我带着当时 4 岁的三儿子两个人临时回了国，在我亲生父亲住的下仁田住了 5 个月。我父亲带着再婚的太太和女儿来羽田机场接我们。

三十年了，因为见过照片所以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当时感动的真是热泪盈眶。可是，我完全不会说日语，父亲也几乎忘了中文，所以各种各样的思绪和心情也没法传达和交流。在父亲家度过的那一夜，什么也没能说，但是我是真高兴啊。在这次返乡探亲时，从在满洲时住在我家隔壁的邻居那里得知我爷爷奶奶大约在战争结束后的 11 月里，在长春的收容所里因病相继过世。

一转眼 5 个月过去了。我和儿子又返回到了家里人在等待着我们的中国。虽然我很舍不得离开父亲，不过因为那时能拿到日本的护照，所以我想什么时候还会再见的。

（停顿）

1977 年，我继父过世，享年 62 岁。我母亲本来想立刻就永住回国的，可是，当初是我母亲不顾家人反对执意要去满洲，再加上她那不肯屈就的倔强性格等，她和娘家的兄弟姐妹有争执，处于不和状态，好像就没法靠娘家

回国了。另外，我父亲也再婚了，所以我母亲连回去的地方也没有。后来，她就和在开拓团时代认识的人商量，终于在 1979 年，她利用临时渡航证书自费回到了前桥市。幸运的是有人为我们做保证人，所以我母亲就直接改办成了永住回国。半年之后，我弟弟一家也永住回国了。我没法想象在日本的生活，所以就向母亲和弟弟打听他们回国后的状况，一家人也一直在商量。虽然我和我丈夫在中国都有工作，但是我们想在日本只要努力总能生活下去的。我们还考虑，如果要回去的话，孩子们小的时候，学话也快，将来也容易自立，所以 1981 年我们一家也永住回国了。

两年之后，我哥哥一家也永住回国了。战争结束将近 40 年，终于我们一家人都回到了日本。另外，1981 年，我母亲把她和继父之间生的儿子-我弟弟一家也接到了日本。

（停顿）

刚回到日本时，我们一家人都不会讲日语。我 40 岁、我丈夫 44 岁。学日语学得很辛苦，但是为了能早日自立我们都非常努力地学习日语。我最初在电子工厂工作了 5 年多。因为在中国我有过缝纫的工作经验，所以后来又到了家缝纫公司，一直在那里工作到了退休。

我丈夫说，来日本已经 37 年了，日本的生活也适应了，现在没什么问题。

我丈夫说来日本挺好的，听了他这话我觉得很高兴。

孩子们在日本的学校里经历了很多事情。最初我和孩子们都不会日语，学校的规则和习惯也与中国完全不一样，孩子们和同班同学吵架打架、惹老



师生气的事也有。我想，那时儿子们都有过很多苦恼、窝心、懊悔的事吧。

（停顿）

1985年我父亲过世，享年70岁；1992年我母亲过世，享年76岁。去年，我也到了我母亲过世的年龄76岁了。像我和我母亲这样，在战争结束后很长一段日子里留在中国的人们、孩子们，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不尽相同。我母亲为了守护自己的孩子，吃尽了苦。我因为和母亲在一起，所以知道自己的名字、出生年月日等等。但是在变成孤儿后被中国人领养的人中，不知道自己在日本的出身的人也很多。另外，有的人被好人家收养、有机会上学、在养父母的呵护关爱中长大，但是也有境遇完全不同的人。

我小时候，为了不受欺负，告诉母亲别用日语，所以到后来变得连日语都不会说了。但是，说到底“我是日本人。”所以，在中国，我一直就想着不能输给中国人。

可是回到日本之后，因为不懂日语，习惯也不一样，所以每天都很辛苦。只是我想，上了年纪以后不能给孩子们添麻烦，所以一直努力学习日语，拼命工作。实在是经历了太多的事了。但是现在我觉得能回到日本，真是很好。

（停顿）

今天，为了让在座的每一个人知道我们的人生经历，同时希望大家也能一起思考遗华日本人的问题，我鼓起勇气说了以上这些话。

谢谢大家听到最后。